

# 蒙古语中\**uɣa*和\**üge*的元音缩合现象

栗林均 著  
朝克 译

## 序

改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的所谓的蒙古书面语自从12世纪直到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成立以来，在七百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蒙古民族的书面语。正因为流传了如此长的时间，蒙古书面语从字形、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少的变化。从另一个角度说，该文字也有它的一定保守性。所以我认为该书面语多少反映着在它成立时的蒙古语口语状态。并且有事实证明它保持着极其古式的语言特征。

我们把同现代蒙古语的长元音相对应的蒙古书面语的正字法也可以看成是表示古式的代表性特征之一。就如众所周知、喀尔喀、鄂尔多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现代蒙古语方言的长元音，在许多场合里同蒙古书面语的  $V\gamma V$ ，或者是同  $VgV$  等连音形式相对应（ $V$  符号表示元音字母）。例如：

mo②	Kh③	
bayatur	bātar	《英雄》
aɣula	ūl	《山》
degere	dēr	《上面》
egur	ūr	《巢》

很早以前学者们就对同现代蒙古口语的长元音相对应的、书面语特有的正字法寄予了极大关注。长期以来把这一语音现象解释为：在蒙古书面语中表示“派生长元音”的语音现象。蒙古书面语的  $V\gamma V \sim VgV$  等连音形式在现代蒙古语里表现为长元音的现象，一直被认为元音间的辅音  $\gamma$ 、 $g$  等弱化后被消失，结果剩下的两个元音经过两次派生合并成为一个长元音④。

因此，符拉基米尔佐夫曾经指出：蒙古书面语  $V\gamma V$  和  $VgV$  等连音形式不完全是同现代蒙古语口语的所有长元音相对应。在喀尔喀方言里就有不少同蒙古书面语的元音间出现的辅音  $\gamma$ 、 $g$  等相对应的喉辅音<sup>5</sup>。例如：

mo	Kh	
baya-	baga-	“小的”
darɣa	darɣa	“首领”
egel	egel	“普通的”
sibüge	söböḡ	“锥子”

把上例中出现的喀尔喀方言的语音现象，符拉基米尔佐夫看成是“形成长元音时的例外

语音变化”。可是，后来服部四郎和波普等两位教授分别在各自的文章里指出：这种有条件的语音变化取决于接续在喉辅音后面的不同长度的元音<sup>②</sup>。总之，应该把这种语音现象解释为：在蒙古祖语里同蒙古书面语的γ、g等相对应的喉辅音本来是在它后续的元音变为长元音的同时消失的。可是，在有些语音环境里γ、g被保存了下来。例如：

\* bayatar → b'atur → bātār

\* baya → baγa → baya

根据上述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领会现代蒙古语的长元音在元音音长方面接替了蒙古祖语的特征这一观点。但是，他们不承认该长元音是“第二位性质的长元音”之说，而且，看成是“派生性质的长元音”。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必合适。无论把蒙古祖语的长元音看成是已被论证的事实，还是对它抱有怀疑态度<sup>③</sup>，反正是刚才提到的：现代蒙古语的长元音是两个元音经过缩合变化后产生的，这一论点是毫无疑问的。

## 一、问题点

在观察了蒙古书面语的VγV~VgV连音形式同现代蒙古语口语的长元音相对应的情况之后，就会发现现代口语里发作长元音的那些音，一般都是同VγV~VgV等连音形式的前后某一个元音在性质上相一致。请看下面比较说明的对应关系。

### 1. 在蒙古书面语里前后元音相同的情况下：

mo	kh	mo	kh	
aγa	ā	bayatur	bātār	英雄
		sayadaγ	sādag	箭壶
uγu	ū	buγura	būr	公路驼
		quruγu	xurū	手指
ege	ē	degere	dēr	上面
		tegerme	tērem	磨
ügü	ü	tügüke᠊	tūxi	生的
		küjügün	xüdzü	脖子

### 2. 在蒙古书面语里前后元音不相同的情况下：

mo	kh	mo	kh	
aγu	ū	aγula	ūl	山
		qataγu	xatū	硬的
egü	ü	əgür	ür	巢
		jegün	dzü	针
oga	ō	toga	tō	数字
		togara᠊	tōrō᠊	白杨
ogu	ō	ogusur	ōsor	细绳
		toγuno	tōno	蒙古包的天窗
öge	ō	ögede	ōd	向上
		bögere	bōr	肾
ögü	ō	čögüken	tsōxō᠋ᠭ	少的

这些元音缩合现象不仅限于喀尔喀方言，而且在鄂尔多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方言里也同样出现。

因此，对这些对应现象进行系统地调查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蒙古书面语的 *uγa* 和 *üge* 等连音形式，只看成是同喀尔喀方面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长元音相对应的语音现象<sup>①</sup>。例如：

	mo	kh	mo	kh	
1°	<i>uγa</i>	<i>ō</i>	<i>doluγan</i>	<i>dolō</i>	七个
			<i>ḷiluγa</i>	<i>džolō</i>	缰绳
			<i>ḷiruγa</i>	<i>džorō</i>	对侧步 <sup>②</sup>
2°	<i>uγa</i>	<i>ā</i>	<i>ḷiruγan</i>	<i>džurgā</i>	六个
			<i>γaruluγa</i>	<i>garlā</i>	出去了
			<i>yabuγad</i>	<i>jawād</i>	走后
1°	<i>üge</i>	<i>ō</i>	<i>ergüge</i>	<i>örgō</i>	房子
			<i>irügel</i>	<i>jöröl</i>	祝福
2°	<i>üge</i>	<i>ē</i>	<i>irelüge</i>	<i>irlē</i>	来了
			<i>engkürüged</i>	<i>eγxrēd</i>	宠爱

假如说蒙古书面语的 *uγa* (*üge*) 这一转写形式是反映着比喀尔喀方言更古的语音发展阶段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同样形式里的连接音在喀尔喀方言里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长元音呢？故此，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各自不同的语音环境。从语言史的角度来讲，不值得考虑一个音（连接音）没有任何条件地任意地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语音（连接音）变化现象<sup>③</sup>。

对于这个问题符拉基米尔佐夫<sup>④</sup>、波普<sup>⑤</sup>以及汤姆森<sup>⑥</sup>等曾经都提出过各自的见解。本文的目的也就是在研讨前辈们所做的那些解释的同时，力求弄清楚各个的问题点，在此基础上我想提出自己的包含若干个新观点的看法。过去前辈们（进行研讨的对象）是在同样前提下对蒙古书面语的 *uḷa*、*üge* 等的转写形式，或者是对 \**uγa*、\**üge* 这一重新构成形式的妥当性进行了研讨<sup>⑦</sup>。

## 二、首先研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

2.7,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蒙古书面语反映着比喀尔喀方言更古的语音发展阶段。所以，他把喀尔喀方言里同蒙古书面语的 *uγa* (*üge*) 相对应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长元音解释为：

“受了第一音节元音的影响而产生的分歧性语音变化。”根据这个观点可以建立如下格式：

1°	<i>uγa</i> > <i>ō</i>	( <i>üge</i> > <i>ō</i> )
2°	<i>uγa</i> > <i>ā</i>	( <i>üge</i> > <i>ē</i> )

在喀尔喀方言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语音变化里，象 1° *uγa* > *ō* (*üge* > *ō*) 形式的元音缩合现象出现在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o* (*ö*) 的情况下。尽管如此，这是随着同化而产生的有条件的语音变化一下面简称为“前进圆唇同化。”<sup>⑧</sup>

的确，在喀尔喀方言里第二音节以下的长元音 *ō* (*ō*)，只出现在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o*、*ō*、*oi*、(*ö*、*ō*、*öi*) 等情况下，在这一点上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在我们将要谈论的蒙古书面语的第一音节的元音是“*i*”的情况下“前进圆唇同化”之说将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例如：

mo	Kh	
jilu $\gamma$ a	džolö	“缰绳”
ǰiru $\gamma$ a	džorö	“对侧步”
irügel	jöröl	“祝福”
čilügen	tšölö	“闲暇”

问题就出现在刚才所揭示的喀尔喀方言的第一音节的元音上。所谓的“i的转折”是指第一音节的元音*\*i*在现代蒙古语里直接受到后续音节的元音影响而被同化的一般语音现象。但是，千万不能根据“前进圆唇同化”之说，把上述现象解释为第一音节的元音*o* (*ö*)是由于受到后续长元音*ö* (*ȫ*)的影响而产生的“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二音节的长元音*ö* (*ȫ*)是受了第一音节的元音*o* (*ö*)的影响而产生的，第一音节的元音*o* (*ö*)和第二音节的长元音*ö* (*ȫ*)的形成过程同“转折”之意是相反的。

看来，要想坚持“前进圆唇同化”的解释，首先要搞清楚刚才例词中的喀尔喀方言里第一音节内元音*o* (*ö*)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同这个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所做的解释也绝非是单纯的。我们可以把他著作中的不同篇幅的解释概括为：

1. 第一：蒙古书面语第一音节中元音«i»不一定反映喀尔喀方言中原来就有的元音*i*<sup>1</sup>。比如说：同喀尔喀方言的*džorö*«对侧步»一词相对应的*ǰiru $\gamma$ a*这一蒙古书面语形式中元音«i»就没反映原有的*\*i*，该单词在更古的语音形式中第一音节里所表现出来的元音是*\*o*。例如：

mo:      ǰiru $\gamma$ a = *\*ǰoru $\gamma$ a* > *džorö*

2. 第二：对“个别i的转折”现象所做的假定<sup>2</sup>。蒙古书面语里第一音节的元音*i*是位于第二音节的元音*u*、*ü*等前面。不过元音*i*不可能都是位于绝对词首。当它出现在词首辅音*ǰ*、*č*、*s*~*š*等后面时产生了下述两个方面的“转折”。

①、随着词首非腭化辅音 *dz* (>*ǰ*) *ts* (>*č*) 等产生 *i* > *u*、*ü* 的转折。

②、随着词首腭化辅音 *dž* (>*ǰ*)、*tš* (>*č*)、*š*·*j* 等产生 *i* > *o*、*ö* 的转折。

其中把后者转折要是根据“逆行同化”的观点解释的话，那么应该把后续音节内的(*u*、*ü*)等不同元音出现在第一音节的情况看成是“特殊的转折”。然而，喀尔喀方言里的*džolö* (>*\*ǰilu $\gamma$ a*)、*jöröl* (*\*irügel*)、*tšölö* (>*\*čilüge*)等词，在第一音节中出现的(*o*、*ö*)等元音确实按照上述转化规律产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观察喀尔喀方言里产生的“脱落、腭化”等语音变化，就会搞清楚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哪一种解释也很难成立的原因。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喀尔喀方言里同蒙古书面语的*ǰ*和*č*相对应的腭化辅音(*dž*、*tš*)等，除了后续元音是*i*之外，其它情况下都产生了“脱落、腭化”等非腭化辅音*dz*、*ts*的变化<sup>3</sup>。

所以，现代喀尔喀方言里所谈到的被保存下来的腭化辅音*dž*和*tš*——是指*\*dži*、*\*tši*等连音现象——它以更古的形式先行于元音*i*之前——该论点是可以成立的。真因为如此，我们去观察喀尔喀方言的*džorö*一词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词首腭化辅音*dž*是表示着该词的第一音节里曾经有过元音*\*i*。总之，在蒙古书面语形式里应该把*ǰiru $\gamma$ a*一词的元音«i»看成是很好地反映了喀尔喀方言的原古形式。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这种原古的语音形式解释为*\*ǰoru $\gamma$ a*，这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第二种解释，假设：①的转折是随着“非腭化辅音”的产生而产生；②的转折是随着“腭化辅音”的产生而产生的话，那么它们是在“脱落、腭化”等语音变化产生分化的时

候各自发展成了不同类型的两种转折。所以，必须看到在①里随着词首非腭化辅音(dz, ts)产生“脱落、腭化”等语音变化的时候，那些例词中第一音节内除了i以外的其它元音都产生了演变。同时我们一定要承认由于②里保存了词首腭化辅音(dʒ, tʃ)，因此，当它产生“脱落、腭化”等语音变化时，元音i也同样被保存下来了(没产生‘转折’)。<sup>②</sup>

概而言之，符拉基米尔佐夫是想指出①和②的演变是不属于同一时代的有条件语音变化，而看成时代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语音变化。因此我们说他所谓的在②产生(i>o, ö)演变时，第二音节里就有u, ü等元音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总之，产生i>o(ö)这一演变时，无论把第二音节的元音解释为u(ü)，还是ö(ö)，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固然，单纯地要求坚持“前进园唇同化”的立场，就如上面所说：由于不能假定“特殊演变”而无法解释dʒolō、jöröl等喀尔喀方言词中第一音节里出现的元音。

所以，我们说他把“i的转折”看成是规则性的单纯的逆行同化现象。从这一角度我们完全能够搞清楚，他为什么没有把不成立的“前进园唇同化”之说原原本本地纳入到他那假定不了的“特殊演变”之中。

## 2.2在卡尔梅克方言形式中

符拉基米尔佐夫为了同时说明与喀尔喀方言并行的卡尔梅克方言的情况，而论述了“前进园唇同化”这一语音现象。

卡尔梅克方言的展唇元音ā和ē是对应于喀尔喀方言的第二音节以下的长元音ō和ö。例如：

mo	Kalm <sup>②</sup>	Kh	
doluγan	dolān	dolō	《七》
jiluγa	dʒolā	dʒolō	《缰绳》
jiruγa	dʒorā	dʒorō	《对侧步》
irügel	jöröl	jöröl	《祝福》
čilügen	tšölē	tšölō	《闲暇》

如果按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说法，那末卡尔梅克方言里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该方言中没产生“前进园唇同化”的结果。反正，他同索绪尔一样把uγa<ā(üge<ē)的缩合现象看成是自生的语音变化<sup>③</sup>。

所以，他只能以卡尔梅克方言的dolān一词的长元音ā为根据，否定根词\*doloyan，同时用uγa这一连接音为前提假定出了doluγan<sup>④</sup>。他写到：假设原形是doloyan的话，卡尔梅克方言的dolōn一词词形也能够成立吧。(蒙古书面语的toγa‘数字’要同卡尔梅克方言形式的带有tō‘数字’的词相对应)。

于此相关，普波也曾经指出：卡尔梅克方言形式的dʒolā“缰绳”、dʒorā“对侧步”等词中出现的长元音ā就象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言，与其说没有表示比喀尔喀方言的dʒolō、dʒorō等更古的发展阶段，倒不如说它所表示的很可能是更新的语音现象<sup>⑤</sup>。总之，他认为卡尔梅克方言的dʒolā、dʒorā等词中出现的长元音ā是由于喀尔喀方言形式的dʒolō、dʒolō等词里第二音节以下的长元音ō失去了(脱落、园唇化)园唇元音的特征后产生的语音现象。

该论点力图把喀尔喀方言形式的dʒolō、dʒorō等词中出现的第二音节的元音o(<i)是受到第二音节以下长元音ō的影响而产生(转折)之说作为前提。并且，这种前提也被无条件地接受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该前提没拿出任何积极的证据。

为此，笔者争取在这里表明自己是支持，喀尔喀方言的dʒolō、dʒorō等词中第二音节的

元音 o 是受到第二音节内的长元音 ö 的影响而产生的论点。那就是被认为同喀尔喀方言以及蒙古语言发展史有着密切联系的鄂尔多斯方言的对应现象。同蒙古书面形式的 jiluγa “缰绳”。jiruγa “对侧步”等相适应的鄂尔多斯方言的第一音节里的元音 i, 同样被保存下来了。例如:

mo	ord	kh	kalm	
jiluγa	džilō	džolō	džolā	《 缰绳 》
jiruγa	džirō	džorō	džorā	《 对侧步 》

我们知道在鄂尔多斯方言里当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i 时, 第二音节的长元音 ö 就产生了“前进圆唇同化”的语音变化。所以说, 除了上述的例举外, 还包括鄂尔多斯方言在内的三个方言的对应现象, 在别处很难见到。要是按照一般地说法去解释的话, 那鄂尔多斯方言的现状是反映着三个方言的更古的共通的语音发展阶段。于是, 我认为对这些语音变化进行如下假定是最为妥当的。

① “i 的转折”: i → o/cō (喀尔喀鄂尔多斯两个方言的共通的语音变化)。

② “脱落、圆唇化”: ö → ā / 位于第二音节以下 (卡尔梅克方言独有的语音变化) 场合。

鄂尔多斯方言中凡是由上述形式构成的词在第一音节里都没有能够把元音 i 保留下来。所以说刚才的例词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例举一些与此有关的词加以说明。(持有时间标志的语音形式就如前面所假定出来的三个方言的共通原形)。例如:

mo		ord	kh	kalm	
iruyar*	irōl	rrōl	jurōl	jurā	“底”
siruγa*	širō	šorō	šorō	šorā	“土”
kirüge*	kirō	körō	xörō	korē	“锯”
jitügen*	džitōn	džötō	džötō	džütēn	“养精蓄锐”
čilügen*	tšilōn	tšölō	tšölō	tšölēn	“闲暇”
irügel*	irōl	örō	jörōl	jörēl	“祝福”

通过例举我们搞清楚了鄂尔多斯方言里凡是比第二音节的长元音 \*ö 先行的元音 i 同样先行于第二音节的长元音 ö, 因此, 词首辅音 \*š 后面接续着的元音 \*i 受后续元音的影响也已产生了“转折”变化。

随即出现的新问题是: 在上面揭示的三个方言里所共通假定出来的原形与蒙古书面语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被认为是由来自于敖尔多斯、喀尔喀两个方言中依然存在着的 \*uγa (\*üge) 这一语音形式的长元音 ā (ē)——例如: mo、abuγad = kh、ord、kalm、awād “取后”——的处理方法。

### 三、下面研讨波普的解释

在喀尔喀方言中:

1° \*uγa > ö ( \*üge > ö )

2° \*uγa > ā ( \*üge > ē )

符拉基米尔佐夫是把这两种语音缩合现象中的 2° 看成是自生的语音变化, 可是把 1° 却解释为“前进圆唇同化”现象。于此相反, 普波把 1° 看成是自生的语音变化, 并且根据条件语

音变化论解释了2°。例如：

“\*uγa中的\*u是属于词干，\*a是属于接尾词的场合：\*uγa>ō，除此之外的场合是：\*uγa>ā”。

如果把1° uγa>ō (\*üge>ō)的元音缩合现象看成是自生的语音变化的话，前面对三个方言的共通原形所做的假设同蒙古书面语的现状直接结合成一体。不过，对有关2° \*uγa>ā (\*üge>ē)的元音缩合现象所进行的解释中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产生的疑问：也就是说如同词干和接尾词的分化一样，形态论和意义上的特征能否作为语音变化的条件起作用。事实已经证明所谓的“一定性质的音韵对应”同词义是毫无关系的，只不过是说明了有关发音方面产生语音变化的规则性。所以，我们说这是依据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去解释的。对此索绪尔曾提示以下的论述：

“再有什么样的记音符号也无法表示音韵现象〔=语音变化〕，无论是实词、形容词之间的差别，还是词干、接尾词、词尾之间的差别都是没有制定，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无限的和无数的。”

另外，我们观察了蒙古书面语abuγad“取后”和boluγad“成后”等词的形态构成，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ab-“取”、bol-“成”等动词词干是通过中间元音-u-作为媒介，同以副动词构成的接尾词-γad结合为一个完整的动词。总之，在ab-u-γad、bol-u-γad等词中uγa这一部分的形态分离是一致的。可是在喀尔喀方言里awād、bolōd等词中有两个不同的对立的长元音，在这种情况下形态素的分离为语音变化的条件没起什么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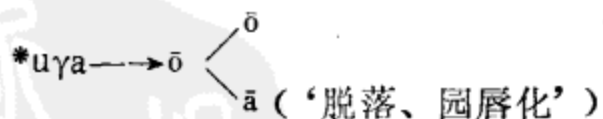
普波的上述解释是在他那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蒙古语比较语言学导论》里谈到的，可是至今未被采用，所以我认为对于前述观点在这里进行反驳是非常必要的。

他在新著里只是把第二音节以下的uγa解释为：在喀尔喀方言里变成了ō（70页之后）。然而，对于\*uγa>ā的语音变化却没有进行专门论述。单从喀尔喀方言形式的dzurgā“六”一词来看，不得不考虑他把喀尔喀方言的\*uγa>ā完全看成是“例外的语音发展”的论点。

要是把刚才的语音现象真的看成是“例外”的语音变化，那么至少至今没搞清楚产生这种“例外”现象的因素，故此，没有必要去原原本本地接受普波的上述解释。

#### 四、下面研讨汤姆森的解释

汤姆森继承普波的观点把喀尔喀方言\*uγa>ō (\*üge>ō)的元音缩合现象，也同样解释为自生的语音变化。可是，他对\*uγa>ā (\*üge>ē)的元音缩合现象所作的假定：是\*uγa>ō (\*üge>ō)这一自生的语音变化产生后，受到第一音节的非圆唇元音的影响，按照“脱落、圆唇化”等语音变化规律产生的语音现象。根据他的论点，\*uγa (\*üge)的语音变化要经过一次\*uγa>ō (üge>ō)的语音发展阶段。例表：



第二音节以下的ō (<\*uγa)，在喀尔喀方言里只保存于第一音节的元音是o (<\*o、\*i)的场合，其它情况下都产生了“脱落、圆唇化”(ō>ā)的语音变化。但是，在卡尔梅克方言里同第一音节的元音毫无关系地普遍都产生了“脱落、圆唇化”的语音变化。再说，用阿拉伯文字标记的属于13~14世纪的蒙古语——木卡迪玛特、阿刺·阿塔布、伊本木罕纳蒙古语辞

典里的所谓中期西部蒙古语也同卡尔梅方言一样与上述的论点有着一定的关系<sup>④</sup>。

如果依据汤姆森的论点去解释，那么同蒙古书面语形式 *abuγad* “取后” 相对应的喀尔喀、卡尔梅克等方言形式的 *awād* 等词一定要经过一次长元音 *ō* 的语音发展阶段。例如：

*\*abuγad > \*abōd > awād*

象 *\*abōd* 一样的中间阶段现在还没得到确凿的证据来解释，只是在理论上被假定罢了。因此，我们说把 *\*abōd* 作为 *abuγad* 和 *awād* 之间的发展阶段来论证确实不切合实际。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观察到在其它元音缩合现象中前后任何一个元音缩合后立即成为长元音而表现出来的情况，就能够领会 *abuγad > awād* 是以原来的形式同其它元音缩合现象共同产生了演变。在它们中间故意地假定 *\*abōd* 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语音发展阶段是很不自然的。

再说，汤姆森一方面把 *\*uγa > ū* 的语音变化看成是“蒙古语共通的发展”<sup>⑤</sup> 另一方面却完全没考虑到中期西部蒙古语与同时代的所谓中期东部蒙古语——即属于13~14世纪的汉字、八思巴字蒙古语的状态。在《蒙古秘史》和《华夷译语》里面的中期东部蒙古语的 *u'a*、或者 *o'u* 等元音连接现象是同蒙古书面语的 *uγa* 相对应，另外 *ü'e*、或者是 *ö'e* 等元音连接现象也同蒙古书面语的 *üge* 相对应<sup>⑥</sup>。例如：

1. *u'a* 以及 *ü'e*

<i>abu'at</i>	“取后”
<i>baru'an</i>	“暗的”
<i>qutu'ar</i>	“第三个”
<i>unu'atan</i>	“骑士”
<i>kidu'at</i>	“杀后”
<i>hiru'ar</i>	“底”
<i>bosu'at</i>	“起来后”
<i>yosu'ar</i>	“由此”
<i>ergü'et</i>	“抬起”
<i>gürü'et</i>	“到达后”
<i>kirü'e</i>	“锯”
<i>hirü'er</i>	“祝词”
<i>ögü'et</i>	“给后”
<i>söyü'er</i>	“教训”

2. *o'a* 以及 *ö'e*

<i>dolo'an</i>	“七个”
<i>nogo'an</i>	“青草”
<i>olo'ar</i>	“以大势”
<i>togo'an</i>	“锅”
<i>širo'ai</i>	“土”
<i>dörö'e</i>	(华) “马镫”
<i>nökö'e</i>	“其它”
<i>ködö'e</i>	(华) “野外”
<i>edö'e</i>	“现在”
<i>jilo'a</i>	
(~ <i>jilu'a</i> )	“缰绳”
<i>jirqo'an</i>	
(~ <i>jirwa'an</i> )	“六个”

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蒙古语的 *\*uγa* 和 *\*üge* 等的发展历史就会感觉到中期东部蒙古语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作为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无论用蒙古书面语标记的，还是以阿拉伯文字标记的蒙古语都没有把园唇元音 *o* 和 *u* (还有 *ö* 和 *ü*) 区分开，但是，在那个时代确实存在这种语言区别。

刚才揭示的例词中 *o'a* 在中期东部蒙古语里大部分出现在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o* 的后续音节里，但是，在若干词里又发现这种语音现象出现在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i* 的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音节的元音是 *o* 的时候，在后续音节里却没有见到 *o'a*，只是发现了 *u'a* 这一语音现象。故此，不能说 *o'a* 和 *u'a* 是相互补充地存在。

简而言之，要是把同蒙古书面语的 *uγa* 相对应的中期东部蒙古语的 *o'a* 和 *u'a* 说成是来源于 *\*uγa*——那么就会构成符拉基米尔佐夫、普波、汤姆森等三位先生所论述的共通前提



——可是，无论如何要搞清楚\**uγa*在中期东部蒙古语里导致*o'a*和*u'a*等分歧性发展的不同语音环境。否则，很容易把中期东部蒙古语的*u'a*和*o'a*等对立现象看成是反映着蒙古语的更古的语音状态。

## 五、结 论

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蒙古语的\**uγa* > *ā* (\**üge* > *ē*)这一元音缩合现象看成是自生的语音变化，但他为了根据“前进圆唇同化”来对喀尔喀方言的\**uγa* > *ō* (\**üge* > *ō*)进行解释，将把*kh*、*džolō*、*džorō*等词中的第一音节的元音*o*只是作为一般的逆行同化现象（‘*i*的转折’）的一个环节未作解释。

另外，普波和汤姆森把这些语音现象看成是词首元音*i*受到第二音节中的长元音*ō*的影响而产生的“转折”现象，然而，把\**uγa* > *ō* (\**üge* > *ō*)则认为是自生的语音变化。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uγa* > *ā* (\**üge* > *ē*)的解释陷入了困境。

在以上所谈到的观点中，无论是有关元音缩合现象的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还是关于“*i*的转折”方面的普波和汤姆森的解释，都是反复地叙述了那些很一般性质的、并列进行的元音缩合现象和“*i*的转折”现象。笔者是想在这两种观点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新的见解。

同我们在这里作为问题来进行讨论的元音缩合现象有关的是共同起源于现代诸方言的最初语音状态，无论是蒙古书面语所反映的形式，还是假定为中期东部蒙古语所反映的形式，不管怎么说，如果把这种语音变化假定为“\**uγa* → \**oγa*（或者是\**u'a* → \**o'a*）等是位于第一音节的元音*i*和*o*的后继音节里产生的语音变化”的话，就能够把元音缩合现象和“*i*的转折”现象作为规则性的语音变化来掌握。

首先我们把蒙古书面语的状态假定为原有形式；（这虽然是重复现象，但是，同‘中期东部蒙古语状态是反映着祖语形式’这一假定所得出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begin{array}{l}
 *u\gamma a \rightarrow *o\gamma a / \left\{ \begin{array}{l} *i \\ *o \end{array} \right\} c \text{ —} \\
 \dots\dots\dots \text{①} \\
 *üge \rightarrow *öge / \left\{ \begin{array}{l} *i \\ *ö \end{array} \right\} c \text{ —}
 \end{array}$$

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该语音变化。

再就是元音缩合现象：

$$\left. \begin{array}{l}
 *u\gamma a \rightarrow \bar{a} \\
 *üge \rightarrow \bar{e} \\
 *o\gamma a \rightarrow \bar{o} \\
 *öga \rightarrow \bar{ö}
 \end{array} \right\} \dots\dots\dots \text{②}$$

要是把符拉基米尔佐夫的上述公式原封不动地引用，那么我们会得出在2.2里假定的鄂尔多斯、喀尔喀、卡尔梅克等三个方言中的共通原形。

随后把它作为“i的转折”现象：

\* i → o / — cō } .....③  
 \* i → ö / — cō }

同时根据卡尔梅克方言的第二音节以下的“脱落、园唇化”等语音变化：

ō → ā } .....④  
 ö → ē }

可以解释各个方言形式的发展历史<sup>③</sup>。（在卡尔梅克方言里重新增加了ē—ε这一语音变化）。

	①		②		③		④		
	↓		↓		↓		↓		
*jilya	→	jiloya	→	dzilō	→	džolō	→	džolā	“缰绳”
*(h)iruyar	→	(h)iroyar	→	iröl	→	zoröl	→	zorāl	“底”
*kirüge	→	kiröge	→	kirō	→	körō	→	köre	“锯”
*čilügen	→	čilögen	→	tšilōn	→	tšölōn	→	tšölēn	“闲暇”
*dolügen	→	dologon	→	dolōn	→		→	dolān	“七”
*bosuyad	→	bosoyad	→	bosōd	→		→	bosād	“站立后”
*ködüge	→	ködöge	→	ködō	→		→	ködē	“原野”
*ögüged	→	ögöged	→	ögöd	→		→	ogēd	“给后”
*abuyad	→		→	abād	→		→	abād	“取后”
*buruyan	→		→	barān	→		→	barān	“暗的”
*kürged	→		→	kürēd	→		→	kürēd	“到达后”

由于中期西部蒙古语状态是属于13~14世纪的语音形式，所以很难考虑到该状态的形成过程也同卡尔梅克方言一样经过了一连串的语音变化。在这里也根本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应该把它看成是独自产生的“脱落、园唇化”语音变化。

### 5.1, 若干个不规则对应以及有关的解释

看来前面被假定出来的语音变化①~④是把蒙古书面语的第一音节的元音i后面出现的 uya 和 üge 等连音形式，期望作为同喀尔喀方言和喀尔多斯方言的ō和ö 等长元音相对应的现象。可是，实际上在鄂尔多斯方言和喀尔喀方言形式里没有同蒙古书面语的：

jiryuyan《六》(cf 秘史 jirgo'wn~jirwo'an)

siryuyad《钻入后》(cf 秘史 širgu'asu《钻入的话》)

sitügen《信仰》(cf 八思巴字<sup>④</sup> šidu'en)

等相对应的长元音ō(ö)。例如：

ord	Kh	kalm	
džurgā(n)	džurgā(n)	zurjān	《六》
šurgād	šurgād	šuryād	《钻入后》
šütēn	šütēn	šütēn	《信仰》

从例词可以看出在蒙古语更古的状态里第一音节中有过元音\*i~\*u(\*i~\*ü)等语音交替现象。要是只限在上述三个方言的对应范围，那就没有必要把第一音节内带有元音\*i的形式假定为它们共通的原形。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如下想法。也就是笔者曾经论证过的：在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里存在着“时代不同的两种类型的转折”<sup>⑤</sup>，可是在上述列举中却被认为属于更古时代的“转折”。因为那时在现代诸方言的第一音节里有u、ü等元音，为此不得不在它后续音节中假定出\**uYa*、\**üge*等连音形式。例如：

* <i>jiryuyan</i>	→	更 古 的	→	* <i>džuryuyan</i>
* <i>siryuyad</i>	→	转	→	* <i>suryuyad</i>
* <i>sitügen</i>	→	折	→	* <i>sütügen</i>

不过，在秘史和八思巴字蒙古语里见到的 *jirqo'an* 一词的 *o'a* 同上述原形不一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假定该词在祖语阶段有过 \**jirYuYan*~*jirYoYan* 这一语音交替现象。附带说一下，我认为不是没有理由把秘史以及华夷译语中出现的表示“六”的另一个形式 *jirwa'an* 看成反映 \**jiryuyan* 的系列。

另外，可以把鄂尔多斯方言形式 *ilo* “虻”一词的原形认为是 *iluYa*。尽管它是以元朝秘史的 *hilu'atu* “被虻刺”为根据的，还是得到人们的承认。然而喀尔喀方言形式的 *jalā* “苍蝇”以及卡尔梅克方言形式的 *ilāsŋ*~*iēsŋ* “蚊子”等词同上述对应但不相一致。

普波从这种对应关系中假定了祖语中的 *hiluYa*~*hilaya* 这一语音交替形式<sup>⑥</sup>，但是，如果把鄂尔多斯方言形式和喀尔喀、卡尔梅克方言形式的对应关系看成是从其它规则性的对应中分离出来而变成了各自独立的语音形式的话，那么我也就把它作为理所应当的结论来遵从。

最后，我们看一看在现代方言中同蒙古书面语形式的 *kiduyad* “杀后”（参见秘史 *kidu'at*）相对应的情况：

<i>ord</i>	<i>kh</i>	<i>kalm</i>
<i>xudād</i>	<i>xjadād</i>	<i>kudād</i> ~ <i>kitəd</i> ~ <i>ketəd</i>

该例词在三个方言中所表现的都不尽相同。把鄂尔多斯方言形式 *xudād* 以及卡尔梅克方言形式 *kudād* 等都可以认为是表明“更古时代的转折”现象。例如：

\**kidu*—>\**kudu*>*kalm*, *kud*—, *ord*, *xudu*—;

笔者曾经把喀尔喀方言的 *xjad* 解释为：*kidu*- 这一原形受了“不完全转折”的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形式<sup>⑦</sup>。要是我们认为同蒙古书面语 *kiduyad* 相对应的是喀尔喀方言形式的 \**xjadād*、而不是 \**xjodod*；卡尔梅克方言形式的 *kitəd*~*ketəd* 等的话，那么就无法假定祖语里曾经存在的 \**kidu*~\**kida*- 这个语音交替现象。

## 引 用 文

栗林均《“i的转折”再论——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的平行性发展——》日本蒙古学会《蒙古研究》总13期，1982年，第37—55页。

——《蒙古秘史中的“i的转折”之问题点》、《语言研究》总82号、1982年、29—47页。

服部四郎《蒙古祖语内的元音延长》，《语言研究》总36号、1959年、第40—54页。

G. 道弗尔《原始蒙古语长元音》芬兰—乌戈尔学报, 第65期。1964年, 第3—21页  
(Deerfer G. "Langvokale im Urmongolisch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 1964, pp. 3-21)

——《原始蒙古语长元音》芬兰—乌戈尔学报, 总70期, 1970年, 第3—24页。

E. 海涅什《蒙古秘史(元朝秘史)辞典》威斯巴登, 1962年。

(E. Haenich, Wörterbuch zu Manghol un Hüca Tobealan [Yüanch'ao pi-shi] Geheime Gesichte der Mongolen, Wiesbaden, 1962.)

F. D. 莱辛《蒙英辞典》修订本, 布鲁明顿, 印第安纳1973年。

(F. D. Lessing et al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corrected rpt. Blomington, Indiana, 1973.)

A. 梅耶《印欧语历史比较导论》巴黎, 1937<sup>8</sup>年

(Meillet, A.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1937<sup>8</sup>)

A. 田清波《敖尔多斯语辞典》纽约/伦敦1968年。

(Mostact, A. Dictionnaire Ordos, New York/London, 1968 (rpt))

——《华夷译语的蒙古语材料》布鲁塞尔, 1977年 (—Le matériel Mongol du Houa I I lu 华夷译语 de Hung-ou (1389) I, Bruxelles, 1977.)

N. 波普《蒙古学的地位和任务》德国东方学杂志。第100期, 1955年, 52—89页。

(Pope, N. "Stand und Aufgaben der Mongistik"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00, 1955, S. 52-89.)

——《蒙古语中 uya 和 üge 的组合》东方学研究。第41卷, 1950年, 第8期。

(—"The groups\* ura and\* üge in Mongol languages" Studia Orientalia XIV: 8, 1950.)

——《蒙古书面语语法》威斯巴登, 1954年。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Wiesbaden, 1954.)

——《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芬兰—乌戈尔学会备忘录, 第110号, 赫尔辛基, 1955年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10, Helsinki, 1955.)

——《八思巴文中的蒙古碑文》威斯巴登, 1957年,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ᠪᠢᠨᠠᠭᠤᠰᠤᠯᠤᠯᠤᠰ Script, Wiesbaden 1957.)

——《有关蒙古语中的内声道位置的软腭塞音》乌戈尔—阿尔泰年鉴, 第31卷, 1959年, 第270—273页。

(—"On the velar stops in the intervocalic position in Mongolian" Ural-Altische Jahrbücher Bd. XXXI, 1959, S. 270-273.)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威斯巴登, 1965年。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1965.)

I. 拉杰韦力基《蒙古秘史索引》布鲁明顿, 1972年,

(Rachewiltz, I. de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loomington, 1972.)

G. J. 兰司铁《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语音比较》社会学报, 芬兰—乌戈尔, 第21号, 1903号, 第2期。

(Ramstedt, G. J. "Das Schriftmongolische und die Urgamundart phonetisch verglich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XI: 2. 1903.)

——《卡尔梅克语词典》赫尔辛基，1976年版。

(—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Helsinki, 1976(rpt).)

F.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讲义》巴黎，1916年。

(Saussure, F.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1916.)

K. 汤姆森《蒙古语中\**uYa*(\**üga*)的发展》东方学汇编，第23卷，1958年，第263—267页。

(Thomsen, K. "Die Entwicklung der Gruppe\**uYa*(\**üge*) im Mongolischen" Acta Orientalia 23, 1958, pp. 263-267.)

В.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导论和语音部分)。列宁格勒，1929年。

(Владимирцов, В. 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халха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Введение и фонети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A. 罗布森丹德布《蒙俄辞典》莫斯科，1957年版。

(Лувсандэндэ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57.)

Г.Д. 桑席耶夫《蒙古语族语言比较语法》第一卷，莫斯科，1953年。

(Санжеев, Г.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Том I» Москва. 1953.)

#### 注:

① 这是笔者把1983年5月21日在早稻大学召开的日本蒙古学会春季大会上发表的草稿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后发出的文章。

② mo = 蒙古书面语。蒙古书面语的主要材料来源是:

F. D. 莱辛著《蒙英辞典》修订本。布鲁明顿，印第安那。1973年。(F. D. Lessing et al,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corrected rpt, Bloomington, Indiana, 1973). 但转写方式是根据:

N. 波普《蒙古书面语语法》威斯巴登，1954年。(N. Poppe, 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 Wiesbaden, 1954.) 标记的。

③ Kh = 喀尔喀方言。该方言的主要材料来源是:

A. 罗布森丹德布《蒙俄辞典》，莫斯科，1957年版(A. Лувсандэндэв «Монг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осква, 1957) 以罗马字转写。

④ G. J. 兰司铁《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的语音比较》社会学报，芬兰—乌戈尔。第21号，1903年，第2期，第21~23页。(G. J. Ramstedt, "Das Schriftmongolische und die Urgamundart phonetisch verglich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XI; 2, 1903, S. 21-23)

В. Я.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导论和语音部分) 列宁

格勒1929年,第192—203页。(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пись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и халхаского наречия, Введение и фонети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стр. 192—203)

Г. Д. 桑席耶夫《蒙古语族语言比较语法》第一卷,莫斯科,1959年,第77—80页。(Г. Д. Санжее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том 1》 Москва, 1953, стр. 77—80)

波普《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芬兰—乌戈尔学会,备忘录,第10号,赫尔辛基,1955年,第59—76页。(N.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10, Helsinki, 1955, pp. 59-76)

⑤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222—237页。

⑥ 服部四郎。《蒙古祖语内的元音延长》“言语研究”第36号1959年。第40—54页。

N. 波普《有关蒙古语中的内声道位置的软腭塞音》。乌戈尔—阿尔泰年鉴,第31卷,1959年,第270—273页。(N. Poppe, “On the Velar Stops in the Intervocalic Position in Mongolian” Ural-Altische Jahrbücher 31, 1959, pp. 270-273.)

⑦ G. 道弗尔《原始蒙古语长元音》芬兰—乌戈尔学报,第65期,1964年,第3—21页。(G. Doerfer, Langvokale im Urmongolischen? I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65, 1964, pp. 3-21)

G. 道弗尔《原始蒙古语长元音? II》芬兰—乌戈尔学报,第70期,1970年,第3—24页。(G. Doerfer, Langvokale im Urmongolischen? I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70, 1970, pp. 3-24)

⑧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196—197页。补充了一部分例词。

⑨ 马片侧步行进的动作。

⑩ A. 梅耶《印欧语历史比较导论》巴黎,1937<sup>8</sup>年,第472页(A. Meillet,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 Paris 1937<sup>8</sup>, p. 472.)

⑪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196—197页。

⑫ 波普《蒙古语中 *uγa* 和 *üge* 的组合》东方学研究。第41卷,1950年,第8期。(N. Poppe, “The groups \**uγa* and \**üge* in Mongol languages”, *Studia Orientalia* XIV:8, 1950.)

⑬ K. 汤姆森《蒙古语 \**uγa* (\**üge*) 的发展》东方学汇篇,第23卷,1958年,第263—267页。(K. Thomsen, “Die Entwicklung der Gruppe \**uγa*(\**üge*) im mongolischen”, *Acta Orientalia* 23, 1958. 263—267)

⑭ 因此,本稿的《\**uγa* 和 *üge* 的元音缩合》之标题,就象上面谈过的那样,一致被认为是具有争论性的问题。笔者认为象这种重新构成的祖语形式没有接受源有的语音现象。

⑮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列书,第197页。*uγa* (*üge*) 中的 *u* (*ü*) 属于第一音节的情况是少见的。所以 *u* (*ü*) 除了个别情况以外,一般使用于属于第二音节以下的场合。

⑯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185—189页。

⑰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181—184页。

⑱ N. 波普《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年。110—119页 (N.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1955. pp. 110-119).

⑲ 他想象 \**juγa* 这一祖语形式在喀尔喀方言里是 \**dzorō*。另外,他还支持鄂尔多斯方

言形式的 *džirō*《对侧步》一词中的第一音节的元音 *i*。

⑳ 拙论《蒙古秘史中的“*i*的转折”之问题点》《语言研究》总82号，1982年，37—40页。

㉑ *Kalm* = 卡尔梅克方言。典籍是根据：G.J. 兰司铁《卡尔梅克语词典》赫尔辛基。1976年版 (G.J. Ramstedt, *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Helsinki 1976 <rpt>)

㉒ 与受其它音韵影响而结合的语音变化相反，它的变化是由于内在的因素导致的。

F.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讲义》巴黎，1949<sup>3</sup>，第199页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1949<sup>3</sup>, p. 199:)

小泽英夫译《普通语言学讲义》1972年版，203页。

㉓ 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例书，第316页。

㉔ 波普《蒙古学的地位和任务》德国东方学杂志，第100期，第73页。1950年 (N. Poppe, *Stand und Aufgabe der Mongolistik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00, 1950. S. 73.)

这种观点后来虽然被汤姆森所阐述过，并且他提出了一种假定（请参改第四部分）。但是，早已被波普所否定。

N. 波普《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威斯巴登，1965年，第7页。 (cf. N. Poppe,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inguistics*, Wiesbaden, 1965. P. 7f)

㉕ *ord* = 鄂尔多斯方言。

A. 田清波《鄂尔多斯语词典》纽约/伦敦，1968年 (A. Mostaert, *Dictionnaire Ordos*, New York/London 1968.) 简化了部分标记方式。

㉖ 沃鲁德 (*ölöt*) 语是属于卡尔梅克方言下属的次方言之一。第一音节内的元音 *ü* 的由来不明确。

㉗ N. 波普《蒙古语中 \**üga* 和 *üge* 的组合》东方学研究第41卷，1950年，第8期，第4页 (N. Poppe, *The groups \*üya and \*üge in Mongol languages*, *Studia Orientalia* XIV:8, 1950年, p.4)

㉘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讲义》巴黎，1943年，第209页。译文本第213页。

㉙ K. 汤姆森《蒙古语中 \**üye* (*üge*) 的发展》东方学汇编，第23卷，1958年，第263—267页 (K. Thomsen, “Die Entwicklung der Gruppe \**üya* (\**üge*) im mongolischen”, *Acta Orientalia* 23, 1958. S. 263—267)

㉚ 出处同上。

㉛ 出处同上，第264页。

㉜ “华”指《华夷译语》(所谓的甲种本)的蒙古语形式。其它是表示《元朝秘史》中的蒙古语形式。华夷译语是根据：

田清波《华夷译语的蒙古语材料》洪武(1389年)布鲁塞尔，1977年版 (A. Mostaert, *Le matériel mongol de Houa IIIu 华夷译语 de Houngou (1389) I*, Bruxelles, 1977.)。元朝秘史蒙古语是根据：

E. 海涅什《蒙古秘史(元朝秘史)辞典》威斯巴登，1962年版。 (E. Haenich, *Wörterbuch zu Manghol un Ninea Tobcaán <Yüanch'ao Pi-shi>*, *Geheime Gesichte der Mongolen* Wiesbaden, 1962.)

(下转第79页)

явсныг тэднээс асуултай ч биш (也不便于问他们和谁上哪去了)〔С. 额尔敦(С. Эрлэ нэ)〕, 等等。-лтай(-лтэй)很少象 -лгүй 那样出现在动词之前连接动词与动词。1982年, 大学生 Д. 达瓦扎布(Д. Даваажав)的毕业论文后附了59个使用了附加成分 -лтай 的句子, 其中除了一个句子中的 -лтай 出现在动词之前以外, 再无其它句子在动词之前使用 -лтай。这个句子是 Хадланд гарна гэж бэлдэж зэхээд машинаар хадсан өвстэй ноцолдох нь залуучуудыг ахлаж ирсэн Батдоржид чамлалтай санагдна。(去打草场和机器、牧草打交道, 带队来的巴图道尔基对此不满)〔М. 却吉勒(М. Чойжил)〕。-лтай(-лтэй)比 -лгүй 用得少。例如, 在 Ш. 那查克道尔基的长篇小说《满都海彻辰》一书中, -лгүй 出现了103次, 而 -лтай(-лтэй)只出现了20次; 在 О. 成德苏荣(О. Цэндсүрэн)的《人的禀性》(《Хүний араншин》)(7,63х. х.)一书中, -лгүй 出现了43次, 而 -лтай 只出现2次

-лтай(-лтэй)很少单独使用, 大多与 биш(不是)一词连用, 表达肯定的意义, 并且接缀 -лтай(-лтэй)的词不多。因此, 不能认为 -лтай(-лтэй)是与 -лгүй 等同的反义词素。

译自蒙古《教育家》(《Сүрган хүмүүжүүлэгч》)1985年,  
第3期, 第29—31页。

原 题: Орчин чагий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лгүй морфем

原作者: П. Бямбасан

(上接第76页)

I. 拉杰韦力基《蒙古秘史索引》布鲁明顿, 1972年。(I. Rachewitz, de 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loomington, 1972.)。但是, 转写时遵从了田清波的标记法。

③ 关于卡尔梅克方言的历史可能还有一种解释: 即①的语音变化后面接续着“转折”音变。在“转折”音变产生后, 随即又出现了 оуа>ā, öge>ē 等该方言独有元音缩合现象。但是, 要注意不能漏掉①的任何音变现象。

④ N. 波普《八思巴文中的蒙古碑文》威斯巴登, 1957年第130页 (N. Poppe,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 ags pa Script, Wiesbaden, 1957, P. 130)

⑤ 前揭拙文, 第38—40页。

⑥ N. 波普《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 1955年, 第40页) (N. Poppe, Introduction to Mongolian Comparative Studies, Helsinki, 1955, P. 40.)

⑦ 拙论《“i 的转折”再论——喀尔喀方言和敖尔多斯方言的平行性发展——》日本蒙古学会《蒙古研究》总13期1982年第52—53页。

译自日本《言语研究》, 第85号, 1985年。